

高瞻遠矚洞燭機先

愛國學人朱家驊

● 王成聖

組敢死隊響應革命

朱家驊（一八九三—一九六三）地質學家，近代政治名人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、廣州中山大學校長、南京中央大學校長、教育部部長、浙江省主席、行政院副院長、中央研究院院長、國民大會代表主席團主席。

朱家驊字驥先，浙江吳興人，生於一八九三年（清光緒十九年）四月十五日，六歲啟蒙，入學塾誦讀四書五經，十二歲前已遍讀諸經，奠定良好的國學基礎。十三歲考入南潯正蒙學堂，兩年後轉學進入南潯公學，於是年底畢業。十六歲赴上海，就讀德國人所辦的同濟醫工學校，開始研習德文，吸取近代知識。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義，革命風潮雲湧，朱家驊滿懷

愛國熱忱，和同學組成「上海革命敢死隊」，響應革命。武昌起義後，清廷猶作困獸之鬥，朱家驊追隨中國紅十字會欲赴漢口從軍，但只隨革命軍參加救護工作三個月即被遣回上海，後來革命軍打到上海，在攻打「江蘇製造廠」一役中，「上海學生革命敢死隊」發揮了作用，協助革命軍掃除餘孽，迅速光復上海，立下首功。民國肇建後，同濟醫工改為同濟大學，朱家驊返回校園進入電機系，為同濟大學首期工科學生，一九一三年後，革命黨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，朱家驊在上海參加了多次聲援活動。

一九一四年隨張靜江赴德，自費留學，入柏林礦冶大學研讀冶礦工程，因第一次大戰爆發，歐陸烽火遍地，乃於一九一七年回國，應北京大學之聘，任德文講師

，年僅廿五歲。次年，獲教育部公費獎學金再赴歐留學，先入瑞士柏爾尼大學研究，一九二〇年轉讀柏林大學地質系，於一九二二年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，一九二四年學成回國，應聘北大地質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。

反抗外侮釀成慘案

一九二五年，上海英租界發生「五卅慘案」，我國勞工死傷百餘人，朱家驊在北京領導青年示威遊行，遙作聲援，接著他又領導反對召開關稅會議，奔走呼號，策劃反對策略。

次年春，他又帶頭反對列強「八國通牒」的蠻橫無理要求，率領群眾遊行示威，向北洋段祺瑞政府施壓，遭衛隊槍擊，釀成「三一八慘案」。北洋政府下令搜捕

他，不得已避入東交民巷，六月，易裝南下，七月抵廣州，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，出任地質系教授兼系主任，到任時，發現校內共黨勢力猖獗，常有搗亂，乃請國民政府下令解散學校，派戴傳賢、顧孟餘、徐謙、丁惟汾及朱家驊五人為校務委員，徹底整頓學校。由於其他四人皆兼有公職，無暇多顧，於是整飭學校的任務，悉由朱家驊一人承擔。

當時，革命軍已誓師北伐，國民政府北遷，廣東空虛，共黨分子氣燄高漲，經常滋事。朱家驊和李濟琛密商發動清黨，清黨後省政府改組，朱氏代理常務委員會主席，兼民政廳長，並任廣州政治分會委員。在代理主席期間，他創辦了兩廣地質調查所，兼任所長。一九三二年辭去所長時，把自己所藏的四千餘冊地質圖書都捐贈了該所。注意南方地質的，他是第一個人。一九二七年七月廣東省政府再改組，

朱家驊調任教育廳長兼中山大學副校長，名義上雖是副校長，實際上一切皆由他負責處理的。他竭力整頓，並且延聘了許多著名的教授。可惜不久，廣州發生了張發奎及黃琪翔的兵變，朱家驊就離開了學校。

一九二七年春，北伐軍光復浙江，任朱家驊為農工廳長，繼又發表民政廳長，離開廣州後，他到浙江接長民政廳。不久廣東平定，原來的各職還是兼領著，於是他奔走於浙粵之間達三年之久。在浙江，三年中他做了幾件重要的事情：一是辦理土地陳報，清丈全省土地，實行二五減租（和現在臺灣所推行的三七五減租完全相同）；二是發動戶口調查，辦理地方自治；刷新人事制度，舉辦縣長考試，籌辦移民東北。此外，還創辦了一個警官學校，和一個地方自治專修學校。這兩校的校長都由他兼任。

建西北西南電訊網

一九三九年，朱家驊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政治會議委員，從此參與中樞高層會議。翌年秋，辭去浙江省民政廳長，回粵專任中山大學校長。十一月，又調任中央大學校長，次年春天，又兼任中英庚款文教基金會董事長。此職使他對國家作了很多貢獻，主要的是修建鐵道。當時除正太、同蒲、廣九三路外，全國鐵路無不受過庚子賠款協助的，添購設施，興築路線。粵漢鐵路株韶段是全

由庚款築成的。再是電訊交通和電氣事業，建造九省長途電話網和西北西南無線電話網。而水利則為導淮三閘之完成。在抗戰時期，粵漢路株韶段和西北西南無線電話網，曾經發揮過很大的功用，在教育文化事業方面，最主要的是考送留英公費生和補助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建築設備。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圖書館都是朱家驊在教育部長任內所創辦的。朱氏原來的計劃，是要和中英教會合作，由中英庚款分年補助建築費，先從中央做起，逐漸擴及各省，使每一省都有博物院和圖書館。可惜抗戰軍興，這個計劃沒有實現。中央博物院的建築只完成了一個輪廓，中央圖書館已來不及動工。

朱家驊在中英文教會董事長任內，還有三項有關抗戰的重要貢獻。一、是搶運古物，當時戰火已逼近南京，但故宮博物院因經費艱窘，無法遷移，他立作緊急權宜處理，不但令會墊付運費，而且發動文教人員辦理搶運。現在臺灣的許多名貴古物，就是當初從敵軍砲火下搶運出來的。二、是收購古籍，抗戰發動後，淪陷區內公家和私人所藏的善本書籍，在亂離之中，頗多散失，朱家驊深恐輾轉相售，流出

國外，特由文教會撥款，和中央圖書館合作，設法在敵後搜購，密運香港，再由香港空運重慶。現在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，多半就是那時購得的。三、是設置內地各大學講座，和辦理科學研究的補助金。抗戰時，北方大學和研究機構，大半停辦或緊縮，學人們都發生了生活問題。為適應這一需要，朱氏立即令文教會在雲南大學、重慶大學、廣西大學、湖南大學等處分設講座，為教授們安排教席，另設科學研究補助金，使青年科學人員仍繼續從事研究工作，以補學術荒落之失。

修法奠定教育初基

一九三一年十二月，至一九三四年四月，朱家驊任教育部長，但未立即接任，至次年二月始走馬上任，短短一年餘，他釐訂小學法、中學法、職業教育法、師範教育法等法規。並親手訂定中小學課程標準，校訂義務教育教科書，為全國教育制度奠定基礎。又國立中央圖書館、中央博物館、國立編譯館，均創辦於這一時期，推廣社會教育，又為掃除文盲，他推動四年制義務教育。發動識字運動，訂定短期義務教育，規定十歲到十六歲的失學兒童

一律入學。他又親自校訂教科書四冊，限定認識一千五百字，每天授課兩小時，期限一年。

一九三二年十一月，朱家驊調任交通部長，仍兼教育部長，直到次年四月始免兼，在交通部三年，他的主要貢獻，消極方面是清理舊債；當時郵政局、電報局、郵政儲匯局、招商局都虧欠累累，日、英、德、美四國借款，本息相滾，無法清償，經竭力交涉，都很便宜的解決了。積極方面，致力於業務改進，添購設備，把有線電無線電合併經營，並配合勸共需要興建九省長途電話網，郵政局電報局也做到合設，在郵局可以發報通話，在電報局也可以發信。同時把中國、歐亞兩航空公司航線加以擴展，南到廣州，北至北平，西北到蘭州、迪化，並試航歐亞國際航線；招商局也收歸國營，力加整頓，並添購了四艘海輪。

保住江南精華地帶

一九三六年春，朱家驊改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。同年底，政府突發表朱家驊為浙江省政府主席，他到任後發現浙省財政極度艱困，虧空八千餘萬元，他竭力整頓

，改革積弊，雖然後來抗戰軍興，開支劇增，浙省進入戰事狀態，但在交卸時，省庫縣庫都有節餘，省庫節餘居然在一千萬元以上。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，日軍在金山衛的全公亭登陸後，上海的戰事急轉直下，接著嘉興撤退，那時防禦金山衛一帶的第十集團軍的六十三師，他們要把錢塘江口的海塘掘了，用決口來阻堵敵軍。這海塘決口之後，浙江的杭州、嘉興、湖州、江蘇的蘇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鎮江、太倉舊八府屬地都會變成澤國。這個地帶是全國精華所在，怎可自行毀滅？朱家驊一面嚴令浙屬各縣設法阻止，一面急電蔣中正委員長說明利害；蔣委員長採納了朱家驊的意見，電令制止。保全了全國最精華地區，也保全了這個地區內的許多生命財產。杭州淪陷前夕，「別動隊」在杭州市內劃分了地區，貼上了符號，準備了火油木材等放火材料，決定焦土抗戰。朱家驊認為一個地方不得已而失守了，這個地區上的人民財產還是我們的，我們終有回來的一天。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，受損害的還是自己的人民。當他獲悉這個確實情報後，立刻用省主席兼全省保安總司

令的命令，嚴予制止。杭州市也因而保全。

一九三八年三月，浙江全省淪陷，朱家驊改任軍事委員會參軍室主任，四月，轉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，兼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。翌年底又調任組織部部長，在此兩項職務任內，他協助韓國革命復國運動，對韓國設在中國的臨時政府力予以承認，並發動韓國在華青年組成韓國光復軍，接受國軍的軍事訓練。

在組織部任職四年餘，朱家驊對戰地政務、黨務、邊疆黨務、學校黨務和婦女運動、農工訓練，都有相當成績。

重視邊疆考察西北

抗戰期間，朱家驊極為重視邊務，力主實邊。他認為經營大西北，是富國強兵必要的工作。他曾於一九四一年夏，親赴西北考察，遍歷甘肅、青海、寧夏、陝西及河南五省，詳細記錄大西北的地理水文、經濟文化、礦物寶藏等，力主蘭州應為全國中心。他認為西北不是個荒涼的地方，而是中國的腹地，人文薈萃、沃野千里，蘊藏無盡的寶藏，所以國父孫中山先生

曾有以蘭州為國都的擬議。西北地廣人稀，如欲使西北地盡其利、物盡其用、貨暢其流，必應充實西北的人力，所以他一再鼓勵青年到西北去。

朱家驊在多次公開演講中主張在西北興建鐵路、公路發展交通，興修水利，擴大生產，廣泛造林，涵養水土，振興畜牧，設置羊毛廠，運用可觀的棉產量，設置紡織廠，只要做好民生條件，居民不請自來。

朱家驊眼光遠大，他認為邊疆民族不論回族、蒙古族、藏族都是中華民族，他舉例說邊疆人過去在政軍方面都有偉大的成就，例如匈奴人金日禪在漢、突厥人哥舒翰在唐、契丹人耶律楚材在元、回族人常遇春在明，都曾轟轟烈烈，出將入相，建立殊勳。因而希望不分彼此，融合成一個民族。

一九四一年十月，朱家驊在重慶和邊疆人士座談，談到邊務，力注重幾件事：一、是衛生和生產；二是教育和文化；三是政治工作人才選拔。在衛生方面，他舉例說：邊疆同胞生活在大自然裏，空氣好，陽光足，身體原該是很好的，卻砂眼病特別多，花柳病和其他傳染病也很普遍

，就是因為沒有醫藥衛生的習慣，犯了病拖延下去，以致一天天的傳染起來，強者竟成孱弱。邊疆地方有極廣大的牧場，很鮮美的水草，牲口瘟疫特別猖獗，就是因為沒有獸醫和防疫設備，以致馬牛羊等做了疫苗的犧牲品。所以邊疆工作的第一個要務就是提倡衛生。衛生工作不但要防疫防病，還要發展交通，推進農業，改良牧草和牲畜的品種，倡導消費和生產的合作社。像毛織、製革、罐頭食品等等，都可就地取材，就地行銷，供應內地，減少入超。邊疆同胞的日用品，像布疋、菸、茶、糖等類，向來取給於內地，經中間商層的剝削，昂貴異常，應當由政府設法貸款，設立合作社管理。如此，邊疆的國民經濟得漸繁榮，邊疆的資源也可成為近代的生產了。

至於墾牧，朱家驊主張只保留部分宜牧牧場，餘地一律開發。有些邊疆人以為草地開墾了，當地人民的生計就被剝奪了。殊不知世界上。游牧生活是很難維持的。因為畜牧佔的土地面積廣大，一家牧場，就是周圍幾十里，人口不得不跟著稀疏，是很不經濟的。所以要多多開墾，由畜牧進化到農耕，由農耕進化到工業，西北

自然會富裕起來。

對於邊疆的教育，朱家驊認為過去邊疆青年到內地求學，畢業後留在內地做事，非常可惜。他覺得邊疆青年到內地可以習文學、法律、經濟或軍事，但以建設家鄉的觀點，仍應多學實用科學，邊疆有豐富的資源：金、鐵、石油諸種礦產，森林和藥材，牛皮、羊毛和骨、角、腸、肉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要把我國變成一個富有的國家，便應該培養大批的學農、學工、學商、學交通管理的人才，方可從事。

邊疆同胞們在學習國文、國語和科學，努力接受內地的文化之外，還應該多多學習自己的語言文字，努力保持固有的文化，使不致湮埋和消失，且應該擴大自己的文化到別處去，使他更有光榮的前途。須知內地的文化裏，就有不少邊疆文化的成分。例如黃河流域人民睡的炕，就是從契丹女真傳進來的，男子所穿的馬褂長袍，是從滿洲傳進來的，就是女子所穿的旗袍，也是學的滿洲裝？胡琴和笛子，是內地音樂裏最主要的樂器，然而琴上加一個「胡」字，表明這是從北面的邊疆傳來的；笛上加一個「羌」字，又表明這是從西

面的邊疆傳進來的。從前既可把邊疆的文化傳播到內地，在內地發揚光大，當然可以再繼續傳播到內地，甚至到外國，在世界上發揚光大就運動技術而言，像跑馬、摔跤、打馬球，都是可以發揚光大的邊疆文化。

定遠營受騙感慨多

朱家驊認為過去邊政失敗，是政策問題，也是人的問題。在政策上過去是放任不管的，由放任而疏遠，由疏遠而陌生。對於邊疆地區的歷史、地理、語言、風俗、人情、宗教缺乏了解，或一知半解。以致舉動皆錯。在人事方面是用人不當，亂管亂動，他舉了一個例子：一九四〇年他到西北訪問，聽說某一旗的工作人員對蒙胞處理不當，心裡很不愉快，不料到了定遠營，他同樣遭到欺騙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：他到了那邊，接觸過許多蒙胞，還想看看他們的草地生活，便問明到草地有四十里路，而且要騎馬去。他想借好了馬匹，第二天清早動身，晚上趕回來，可是當天派駐該地的某專員來會他，說：「請部長不要去罷！明天我們要開會歡迎部長，就請在這裏多盤桓幾天罷！」但他堅持

要去，專員無可奈何，便請他在歡迎會中致詞後再去。並且說次晨八點鐘就開會，他恐怕去草地來不及，當下商定了七點鐘開會。專員說：「草地路並不遠，汽車也可以開去，約半點鐘左右就到了。」他雖懷疑此話和別人所說的不合，但聽專員說得那般確定，也就放了心。那知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過了七點鐘，不見專員來約，到了八點鐘還不來，直到了八點半鐘，才由當地駐軍的團長來陪他去。十點多鐘歡迎會才開完，他們馬上坐了汽車前往，果然不久便到了，下車一看，草地上有幾十頭羊，一個蒙古包，裏面住了幾個男女蒙古同胞，可是裝運貨物的車輛，還停留在旁邊。這分明是為了敷衍上級視察，當天早上從定遠營搬來的，所以拖延了時間來佈置。他當時察覺這種蒙蔽的行為，嚴加責問。

這位專員理屈詞窮，只得承認了是偽裝，那些蒙古同胞也承認了受專員的命令，而搬來給人看的。由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，有些在邊疆工作的人員是何等的墮落！他們抱著「天高皇帝遠」的心理，隨心所欲而行事，所以朱家驊覺得治理邊疆要選用篤實優秀的人才行。

設置邊疆文教機構

朱家驊推崇邊疆民族，認為他們也有光榮的歷史，就蒙古人來說，他們曾囊括亞非歐洲四十二個國家，武功輝耀全球，兵鋒遠達中歐，侵入德國東部，烏克蘭的基輔，當時就是一個蒙古汗國；現在蘇俄的首都莫斯科，是他們的勢力中心；蘇俄南方大城南古比雪夫，是他們在歐洲最後的大據點。在印度存留著許多土邦，人民多至一、二千萬，這些人多是元太祖的後代。再說西藏，吐蕃在唐代非常強盛，有極優美的文化，有哲學，有文學，有藝術，他們在思想上影響了亞洲各民族。凡是遊覽過規模宏大的喇嘛寺的，必會驚奇他們文籍的豐富和藝術的高超。他們都懂得「因明學」，擅長辯論術，他們在寺院裏，常常為了經典上的一個問題，連開幾天辯論會，直到這一個問題解決了才罷休。這種研究精神，是很值得欽佩的。

由於朱家驊重視邊疆，就利用黨內組織部門的關係，再加上他經營的庚子賠款，在中央設置了國立邊疆教育館，在教育部設置邊疆教育局，在國立西北大學及中央大學設置邊政系，培養人才，蔚為國用

，可惜他的努力，後來因剿共局勢逆轉，未能發揮實際效力。

一九四一年底，朱家驊奉命兼任考試院副院長，兼了兩年多，由於工作太忙，乃懇辭兼職，卻被發表為國民政府委員，一九四三年冬，又奉令重掌教育部，這是他第三度擔任教育部長。由於抗戰勝利在望，他致力淪陷區政府文化的復原與重建。次年初夏，抗戰勝利，日本投降，他全力推動復原重建並謀求革新。此時，共黨到處鼓動學潮，朱家驊為此耗去不少精力，但仍修正中小學課程標準，釐訂大學課程，使教育逐步邁上正軌。

搶運珍貴國寶來台

一九四八年冬，中共叛亂擴大，南京危殆，他盡全力籌款、遣人，爭取交通工具，搶運故宮、中央兩博物院、中央研究院、中央圖書館重要文物書籍來台。更於萬難中爭取到專機，派往北平，由危城搶運學人出險。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朱家驊當選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，一九四八年三月出席第一次會議。當選主席團主席，選舉第一任總統、副總統，以後出席二、三次會議

均連任主席團主席。一九四八年冬，行政院改組，朱家驊調任政務委員，次年夏，轉任行政院副院長。同年底，政府遷臺，次年三月，內閣再度改組，朱家驊受聘為總統府資政。從此專心學術研究及致力國民外交。

對中研院貢獻卓越

從一九三六年起，朱家驊即兼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，曾幾度辭職，因院長蔡元培堅留未果。到了一九四〇年蔡氏病逝，他又被推舉為繼任院長，到政府遷台後兩年始交棒，服務了十多年，中研院是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，主要任務有二：一是聯繫和獎勵學術研究，一是自設研究所，規模相當的大，在撤退大陸之際，已從十個研究所增到十四個研究所。

朱家驊對中研院主要的貢獻有三：一是辦理院士選舉，院士是院的組織基礎，自院士選舉以後，中央研究院纔完成了體制，網羅全國第一流學者，致力於聯繫和獎勵學術研究工作。二是各研究所的歷次遷移，從抗戰初期，搬到後方，勝利以後，又從後方搬回南京、上海、北平，部署安排，極費心力。三是遷臺後的復建工作

，這一工作，較在大陸時代更是艱困。一九四九年撤離大陸時，因為時間倉促，交通困難，經費無著，只有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數學研究所，能遷來臺灣。抵臺之初，經費極度困難，工作無從推進，但由於朱家驊的努力，在短短幾年之中。不但在北近郊南港建立起新院舍，還恢復了動物研究所、植物研究所、化學研究所，又新添了近代史研究所、民族學研究所。使自由地區的學者，在艱難情況下，仍然能致力科學研究工作，這都是朱家驊的功績。

由於中央研究院編制和經費有限，不能容納院外眾多的學人研究，他乃於一九五〇年秋創辦「大陸雜誌」，經營十多年，歷經艱苦，但始終維持高水準的學術刊物，獲國內外學人普遍讚揚。

國民外交卓然有成

此外，朱家驊一直重視國民外交的工作，早在二次大戰前，他即在南京主持中國國聯同志會，一九三八年任國聯同志會世界協會副會長。國聯解散，聯合國成立，朱家驊又把國聯同志會改組為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，同時當選為聯合國同志會世界協會名譽會長，為實踐聯合國憲章的

基本精神而奉獻心力。一九三六年夏，他發起組織中德文化協會，擔任會長，一九四二年組織中印學會，後來又發起中韓文化協會。這幾個有關國民外交的團體，一直是由朱家驊主持推動的。

朱家驊奔走國事五十餘年，經常數職兼顧，但由於他能卓越，精力過人，都能勝任愉快，而且在短期內做出傲人的成績，朱家驊可說是中國近代最傑出的人物之一，他是科學家、政治家，是講壇重量級的教授，也是重要機構的領導人。他早年患有胃疾，因為掌理要政，夙夜從公，未遑根治，晚年因血管硬化而患心臟病，於一九六三年逝世，享年七十歲。

聖文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

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

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、要目有：無所不談札記、憶昆明、一代學人柳詒徵、項羽新傳、感懷于右任先生、袁世凱的悲劇、民初政壇秘辛、蜀中遺老趙熙、五卅慘案回憶錄、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、清代江蘇兩賢哲、梁鼎芬的風範、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、天才詩人黃仲則、樊增祥與易順鼎、王國維其人其學、民主運動的新階段、一代學人陳含光、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、內容精彩、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，中外訂戶八折優待。收 一四四元，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